

中国历代文选



中国历代文选

上

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

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中国历代文选

下

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

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宁成春

中国历代文选（共两册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 66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30 插页 4

1980年9月北京第1版 198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,001—100,000

书号 10019·3008 定价 2.80 元

前 言

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，大体可分为周秦两汉、魏晋南北朝、唐宋元明清三个历史阶段。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散文，无论是思想内容、艺术形式都各有其显著的特点。

周秦两汉(公元二世纪以前)是我国古代散文的成熟时期。

先要说明这么一个重要问题：散文在上古时代，它的发展，比之诗歌，有个不同之点，它总和书契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鲁迅曾经指出，“中国的言文，一向就并不一致的，大原因便是字难写，只好节省些。”《尚书》“难读”，不一定“照写口语”，只不过是“当时的口语的摘要”，“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”“还要繁也说不定的”^①。这段议论，已经把我国古代散文和口语差异的历史渊源科学地讲了出来。我国古代散文形成一种特殊的体式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。“言文”“不一致”，带来了古代散文“难读”的不可避免的现象，但它却又给散文从口语中抛弃一切偶然的、暂时的、不规范的成分而提炼成明确的和精选的文学语言，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^②。纵观古代散文的发展史，各方面的问题虽然不少，但文学语言的变化却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它正是在克服前者（“难读”）而发扬后者（“明确”、“精选”等）的步伐中前进的。

晚周春秋战国（约公元前八世纪到前三世纪）是我国古

代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。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。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里面来，形成所谓“诸侯异政，百家异说”^③的局面。这样的局面，对散文提出了为现实服务的迫切要求，于是散文的前进步伐，大被推动。生产力的发展，也包括了书写工具的进步。散文的写作，为了适应“异政”、“异说”对它所提出的需求，利用了书写工具进步的条件，冲破“难读”的《尚书》之体的樊笼，来了一个飞跃的变革。记事之史，论理之著，《左传》、《国策》，《庄》、《孟》、《荀》、《韩》，无不是这一飞跃变革中的产物。

毫无问题，晚周散文都是有明确的写作目的的。那时候的写作者发愤于著书立说，用他们的著作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，学术见解，历史观点，决不是“治怪说，玩奇辞”^④，找题目，做文章。但这是不是就可以笼统地下一个结论，说他们“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”，把这些著作都屏绝于“文囿”、“辞林”之外呢^⑤？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。晚周散文虽没有离开政治、历史、学术著作而独立，但从写作实践中，作者已经认识到技巧和内容——即文采和实用之间的关系。他们提出“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”，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^⑥；“情欲信，辞欲巧”^⑦；这些议论都足以表明技巧和内容对立统一的关系。著作有了文采，才能增强它说理、叙事的形象性和生动性，才能增强它的感染力，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职能，才能极大地提高它的实用效果。这是一条经过实践检验找到的散文写作道路，所以刘勰曾把“志足而言文，情信而辞巧”看作是“含章之玉牒，秉文之金科”^⑧，对它的评价是很高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晚周散文在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曾“显示出永久的魅力”，成为“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”^⑨。

晚周散文在写作上所提出的“文”和“巧”是什么？它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产生过什么重大影响？这是值得探索的问题。本文不可能作全面的论列，只想讲一讲对后代关系较大的当时关于散文写作的两句话：一句是“辞达”^⑩，一句是“修辞立其诚”^⑪。

“辞达”的要求不仅致使散文写作迅速走向摆脱“口语的摘要”的道路，而且还推动作者对于文学语言、表现手法作全面精致的讲求，以期把自己的心志淋漓尽致地倾泻出来，强烈地传达给接受者。我们都知道，文学语言和表现手法，在诗歌创作方面，从上古歌谣到《诗》三百篇，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经验。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^⑫“学诗”正是通向“辞达”的主要津梁。而战国时代，已经是南方歌谣经过楚国诗人吸取、提高达到“楚辞”代替《诗经》的时代。“楚辞”——也即是所谓“辞赋”，对于当时散文写作的发展，产生剧烈的影响。“论本事而作传”^⑬的著名史传散文《左传》，也有“富而艳”之誉^⑭。铺张扬厉的辞赋手法大大影响到晚周散文的发展，这便是“辞达”的全部意义。

“修辞立其诚”，这不仅向作者提出了形式服从内容的问题，而且，一个“诚”字，告诉作者，要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增强文章的艺术魅力。前面讲到“情欲信，词欲巧”，“词”“巧”的前提还是“情”“信”。没有真情实感，史传既不可能“疏通知远”^⑮，子论也难作到“言之成理”^⑯。真情实感来源于生活。“立诚”，要靠生活实践，不能只凭主观驰想。“洗洋自恣以适己”^⑰的理论散文名著《庄子》，有人说它“了不异人意”^⑱。这句话启发我们可以从生活、人情的角度去理解《庄子》的文学价值。不管他什么“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言，无端崖之辞”^⑲，总无法

离开“人间世”的现实生活。高尔基曾指出：“神话的创造就其基础讲来是现实主义的。”^{②①}如果说，散文的辞赋化在写作上增加了浪漫主义色彩，那么，《庄子》这部包含许多神话在内的浪漫主义散文名著，它的艺术魅力也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。

晚周散文不仅在文学语言方面有重大的变革，而且在艺术方法方面也有所创造，这主要是诗歌——辞赋对散文写作所发生的巨大影响。它虽然不以单篇的形式出现，但在散文发展史上的成就，已经是许多方面达到成熟而为两汉以后散文导夫先路了。

秦汉的散文正是沿着晚周的发展道路前进的。由于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的建成，战国时代“百家争鸣”、“处士横议”的条件消失了。从秦“燔灭文章，以愚黔首”^{②②}，到汉“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”^{②③}，那种“越世高谈，自开户牖”^{②④}的弘编巨著，已不多见。然而散文的写作，则又有新的发展。上文讲到辞赋对散文发展的影响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。散文的发展还反过来影响辞赋。汉赋盛极一时，它比之“楚辞”，在体制上更加解放，也更加接近散文。前人已经谈到，“京都诸赋，苏张纵横六国，侈陈形势之遗”^{②⑤}。这种现象，也可以谓之“辞赋散文化”。辞赋、散文互相影响的结果，使散文单行篇章的数量，逐渐增多，叙事、议论之外，又增添了抒情成分，而且已经有了象辞赋——诗歌一样的独立的抒情散文。号称“实录”^{②⑥}的著名史传文学巨制《史记》，它不仅是“史家之绝唱”，而且是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^{②⑦}。这雄辩地说明汉代散文与辞赋的密切关系。

东汉以来，虽则思想“渐靡儒风”^{②⑧}，文章“体势漫弱”^{②⑨}，然而“兴楚而盛汉”^{③①}的辞赋，仍在继续发展；民间歌谣，采

入乐府，朝野流行，促进诗歌新形式的成长；辞赋、诗歌、散文的发展，正在互相加大影响。专业的文学作者纷纷出现。范曄《后汉书》，比之前史，多了《文苑传》。《文苑传》所载诸家的篇什，除了诗、赋之外，还有颂、赞、牋、奏、令、策、书、记、檄、诔、吊、祝、碑、铭、箴、论、杂文诸目，真是“各体互兴”，“众制锋起”^{③0}。作为子、史专著附庸的散文，早已经独立。从晚周到东汉是古代散文的成熟时期，在这些史实中可以得到说明。

魏晋南北朝(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)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变化时期。

历史上，魏晋南北朝曾出现过较长时期的政权分裂，然而从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，却是在民族斗争与融合中把经济和文化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时代。南方士族统治政权在文化上占优势，它的基础是汉末建安曹氏执政时期奠定下来的。文学史都要讲“建安时代”，鲁迅曾把建安时代称为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^{③1}。出现这样的时代，与学术思想的相对解放有关。鲁迅指出，曹操执政时期，“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尚通脱。”“因思想通脱之后，废除固执，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，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。”^{③2}“通脱”——思想的解放，不仅自魏迄隋，刑名释老，相继争锋，而且俗儒不读文集，见笑通人^{③3}。包括诗、赋、散文的创作、研究在内的文学，终于特树一帜，与儒（孔教）、玄（释老）、史学并列^{③4}。以诗赋领先的文学风尚，所谓“体气”、“神思”、“风骨”、“情采”的探求^{③5}；“俚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”^{③6}，“善识声韵”，“皆用宫商”^{③7}的追逐：毫无例外，风靡散文，使散文的写作愈加

接近诗赋，讲究对偶声律。各类散文中，除记叙之体略存《左》、《史》旧式外，少有不受影响的。宋齐以后，有“文”、“笔”区分之说^⑧。虽则当时作者认为“手笔差易，文不拘韵故也”^⑨，但对于“笔”（散文），并没有轻视。颜延之说：“竣得臣笔，测得臣文。”^⑩萧纲说：“谢朓、沈约之诗，任昉、陆倕之笔，斯实文章之冠冕，述作之楷模。”^⑪这些例子说明，“文”和“笔”基本上是受到同等看待的。散文在此时不但从子、史专著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，而且同诗歌、辞赋一起，摆脱儒、玄、史学的束缚。“吟咏情性”，“操物写志”^⑫，都不复有什么拘检。这就为文学创作按照自己发展的规律而发展提供了条件。《文心雕龙》“文”“笔”并论，《文选》各体兼收，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产生的。这两部书已公认为中古时代总结文学创作经验的经典著作，它们对我国文学的发展，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，是毫无问题的。不过，过分强调文学的独立性，完全否认它和儒、玄、史学的关系，而且把创作限制在抒写个人哀乐，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作者，又大都是豪门贵胄，生活空虚，只能从追求声律、偶俪一类技巧来评论创作，这就必然会导致形式主义的滋长蔓延。“八代之衰”^⑬，“衰”就“衰”在形式主义。然而古代散文成熟以后经过这个历史阶段的变化发展，这不仅是无法抹杀的史实，而且它对唐宋以来的所谓“古文”运动，正是对立统一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。“相反相成”，它在散文发展史上所取得的成果，是被后代有出息的作家所批判地吸取了的。

唐宋元明清(公元七世纪到十九世纪)是古代散文的定型时期。

南北隔绝,文化风尚,已有不同。南朝末期的浮靡文风,影响北朝,引起北方上层人士的不满。北周苏绰,隋初李谔,都曾致力于改革文体^④。他们看到了文章必须改革这一历史趋势,却并没有找到按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改革的正确道路,收效甚微。唐王朝的建立,经过南北朝长时期的民族斗争与融合,政权统一,生产发展,南贵“清绮”,北重“气质”^⑤的风尚,熔为一炉,为我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峰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,提供了条件。在文学方面,又是诗歌领先。初、盛唐各家,取径不同,流派各异,然而都以他们介入社会生活的创作实践,一变梁陈委靡浮薄的诗风。“骈四俪六”^⑥的文章,显然已经不适合这一新时代的要求。八世纪末期便有“文章三变”之说^⑦。也象诗歌标榜“复元古”^⑧一样,从陈子昂、张说到李华、萧颖士、独孤及,他们打起“振中古之风”^⑨的旗号,为八、九世纪间的“古文”运动开创了道路。“古文”运动的领袖人物是韩愈、柳宗元。他们的政治见解、学术思想,本不相同,然而在散文写作上的主张却很一致。他们主张“文”(韩、柳所谓之“文”,都指散文,不是六朝“文”“笔”区分之“文”)以“明道”^⑩,在“文”和“道”——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,肯定形式要充分表达内容。“明道”,说明了“文”的职责,也强调了“文”的作用。“文”不能离开内容而追求技巧,这对魏晋南北朝散文写作逐渐形成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倾向,确实是一服对症下药下的清醒剂。堆砌词藻,言之无物的文风,这时候继诗歌改革之后,在散文方面,来了一个大扫除。韩、柳——特别是韩愈,“摧陷廓清之功,比于武事”^⑪,这样估价他们“古文”运动在散文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,并非夸大。然而韩、柳对于“文”“道”关系的见解,并不是简单地要散文

退回到作为子、史附庸的老路。“文学自觉”，显然不可能从建安时代已经迈出步子又向后转。他们所要“明”的“道”，不一定能超越八代，远迈周秦，甚至不免“局促儒言之间”^②，但都鲜明地具有时代色采，在不同的程度上干预了当时的现实生活，对时弊作了一定的揭露与谴责。这说明，他们尽管“为道不同”^③，却对“修辞立其诚”这一作为优秀散文应当遵循的传统准则，在写作实践中都有所反映。“明道”，也并没有导致他们因为重“道”便走向轻“文”。韩、柳对于散文的写作，要求“阅其中而肆其外”^④，认为“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”^⑤，“阙其文采，固不足以竦动时听，夸示后学”^⑥，所以他们作文，从不敢“以轻心掉之”，“以怠心易之”^⑦。在散文的艺术技巧方面，他们是多么严肃认真地对待啊！

韩、柳把“古之立言者”^⑧作为他们改革文体的典范，并不是要把散文的写作拖转到“难读”的上古之书境地。对抗当时“类于俳優者之辞”^⑨的形式主义文风，他们确曾提过“惟陈言之务去”^⑩的主张；但同时又指出，写作必须“文从字顺”^⑪，“章妥句适”^⑫。这才是韩、柳“古文”运动在文学语言、篇章结构、艺术方法诸方面“自树立，不因循”^⑬的创新精神的全部内容。然而在唐代，韩愈门下皇甫湜诸人，却以“异于常”的“奇”，“出于众”的“怪”相矜尚，片面强调“奇”才算“意新”，“怪”才算“词高”^⑭，把“古文”引向了脱离时代，背弃群众的狭路。这就使北宋时代以欧阳修、苏轼为代表的作家，不能不发起第二次“古文”运动。这次“古文”运动，也以“文格复古”为旗号，他们提出“平淡造理”的写作要求，以对抗当时承袭晚唐文风的“险怪之语”^⑮。特别对于“辞达”这一散文写作的传统准则，作了大力的宣传，苏轼说：“辞至于

能达，则文不可胜用矣。”^⑧ 宋元以来，我国封建社会已在走下坡路，作家意识往往困窘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之中。然而韩、柳、欧、苏所开辟的平正通达的散文写作道路，却一直为思想开明、辞旨慷慨的属文之士所遵循。接轳继轨，踵事增华。唐宋“古文”实际上已取得了散文的“正统”地位。而且韩、柳、欧、苏以来，散文与诗赋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，文学史上诗赋先于散文的老例已经改换了。韩愈“以文为诗”^⑨，苏轼“以文章馀事作诗，溢而作词曲”^⑩，他们在诗词中都别开一派。诗歌的创作，往往受到散文的影响，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显得更重要了。

在唐代，“古文”之称也象“古体诗”一样，是指“古体之文”；与它相对的还有“今体”（或称“近体”）^⑪。“今体”之文在后代虽不象“今体”之诗那样声势浩大，但并未绝响。而且在某些官方文件的程式中，所有“古文”作家，包括韩、柳、欧、苏在内，也不得不采用“今体”。那些官样文章当然好的很少，以“今体”抒情写志，自唐迄清，却时有佳作。“古”“今”两体，单複分途，也有左右采获，不主一是的作者，这就使我国古代散文，既有定型，又复丰富多采。以主流自居的清代桐城派，总结“古文”写作，有所谓“神”、“理”、“气”、“味”、“格”、“律”、“声”、“色”八种“义法”^⑫。实际上，这些原则和方法，“古”“今”各体，多属共通，不过具体的要求有所不同罢了。

由于封建社会末期新兴文学样式如戏曲、小说之类不断出现，自然要闯进散文的领域。一些囿于“正统”思想的作家，因循守旧，故步自封，不论是疏散的“古文”，还是骈俪的“今体”，在他们的笔下，缺乏灵魂，空存躯壳，遂不免产生

形式主义之作。官定的“八股”“时文”程式，更达到形式主义的极点，阻碍散文的发展，流毒无穷。“五四”运动时期，提倡白话文，正是针对这些谬种来一个大解放。然而，对于古代散文的发展，不能因此作反历史主义的、形而上学的轻率论断。批判地继承和借鉴古代散文这笔遗产，仍然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“古为今用”的一个重要内容。这就是我们编选这部《中国历代文选》的目的。

“散文”这个名词，本是唐宋以后与“骈文”相对而出现的。后人又赋予了与“韵文”相对，略如六朝所称之“笔”的含义。现代作家却采用了这个名目作为区别于诗歌、小说、戏曲的一种文学样式。我们这个选本，根据古代散文的历史发展，斟酌古今，既着重选入了疏散之体，也不排斥骈俪之作，还选了一些散文化了的有韵之文（如赋、颂、碑铭、吊文等）。所选作品，以短小精悍为主，对于有价值、有影响的弘篇巨制，也有少量录入。还从不同的角度，考虑到历代作家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多种体裁，力图选得全面一点，妥当一点。当然，“选本所显示的，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，倒是选者的眼光。”^①象我们这样的水平，“眼光如豆”之讥，知所难免，亟望于专家和读者的指正。

在校注方面，入选的文章，尽可能采用各种版本加以比勘。正文以一本为主，据他本勘订的字句，在注释中说明。每篇文章，都标点分段，并概括地说明段落大意（少数短文例外）。作者小传，力求简要。著名作者，则扼要介绍他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。每篇文章都在解题中简要说明写作的时代背景、作品的主要内容及其艺术特色。对文章不

作过细的分析，避免掺入主观的论断。注释力求准确、通俗、简明。除解释词、字外，也注意对整句和上下文作必要的疏释。文章涉及的史实，一般只作通俗的概述，必要时才引用史料原文。文学语言是有继承性的，有些成语、典故，如不征引原作，就不能理解文义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也适当加以引用疏解。注释遇有歧义，一般以一说为主，必要时两说并存，供读者选择。凡旧说有讹误的地方，我们不采用，便不再列举误说又复加以辩驳。

本书由屈守元同志主编。参加编辑工作的有王文才、雷履平、魏炯若、王仲镛、罗焕章、王泽君、常思春等同志。古典文学教研组还有一些同志作了抄稿、校稿的工作。

本书编选过程中，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志认真、细致地审阅稿本，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。对此，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。

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

【注 释】

① 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。

② 真正的文学语言是从劳动大众的口语中吸取来的，但经过古典作家的提炼，和它的本源已大不相同。可以参看高尔基《和青年作家谈话》，《高尔基选集·文学论文选》第294—295页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）。

③④ 用《荀子·解蔽》语。

⑤ 见萧统《文选》序。

⑥ 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。

⑦ 《礼记·表记》。

⑧ 《文心雕龙·徵圣》。

⑨ 借用马克思论希腊神话的话，见《〈政治经济学批判〉导言》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二卷第114页。

⑩ 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
⑪ 《易·乾·文言》。

⑫ 《论语·季氏》。

⑬ 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
⑭ 见范宁《〈谷梁传〉序》。韩愈《进学解》：“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。”“浮夸”也是“富而艳”的意思，指夸张的艺术手法。

⑮ 借用《礼记·经解》论《尚书》语。

⑯ 借用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语。

⑰ 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。

⑱ 庾敳（子嵩）评《庄子》语，见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。

⑲ 《庄子·天下》。

⑳ 《苏联的文学》，见《高尔基选集·文学论文选》第322页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版）。

㉑ 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
㉒ 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

㉓ 用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语。

㉔ 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内篇·诗教上》。

㉕ 班彪论《史记》语，见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。

㉖ 见鲁迅《汉文学史纲要》第十篇《司马相如与司马迁》。

㉗ 用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语。

㉘ 用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语。

㉙ 用《文心雕龙·论赋》语。

㉚ 用《〈文选〉序》语。

㉛㉜ 《而已集·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。

㉝ 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说：“俗间儒士，不涉群书，经纬之外，义疏而已。”为此，他举邳下诸儒不知《王粲集》中有难郑玄《尚书》之文，为崔文彦所笑的故事。

㉞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于儒、玄、史学之外立文学馆，见《南史·宋本纪》。

㉟ “体气”一词见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。《文心雕龙》有《神思》、《风骨》、《情采》等篇。

㊱ 见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。

㊲ 见《南史·陆厥传》。

㊳ 《文心雕龙·总术》说：“今之常言，有文有笔，以为无韵者笔也，有韵

者文也。”参看刘师培《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》第五课《文笔之区别》一节。

③⑨ 见《宋书·范晔传》载晔《与诸甥侄书》。

④⑩ 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。竣和测是延之的两个儿子。

④⑪⑫ 萧纲《与湘东王书》，见《梁书·文学·庾肩吾传》。

④⑬ 苏轼《韩文公庙碑》说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“八代”，指东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，见郎晔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五十五。

④⑭ 见《周书·苏绰传》及《隋书·李谔传》。

④⑮ 见《隋书·文学传》。

④⑯ 用柳宗元《乞巧文》语。

④⑰ 梁肃《补阙李君前集序》说：“唐有天下凡二百载，而文章三变：初则广汉陈子昂，以风雅革浮侈；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弘茂广波澜；天宝以还则李员外（华）、萧功曹（颖士）、贾常侍（至）、独孤常州（及）比肩而出，故其道益炽。”这里所指的“文章三变”，与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不同，《新唐书》并论诗文，今所不用。

④⑱ 李白《古风》一：“圣代复元古，垂衣贵清真。”

④⑲ 用独孤及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》语。

④⑳ “文者以明道”，见柳宗元《与韦中立论师道书》。

⑤① 李汉《昌黎先生集序》。

⑤② 章炳麟《国故论衡·论式》说：“李翱、韩愈局促儒言之间，未能自遂。”

⑤③ 欧阳修《唐柳宗元殷舟和尚碑跋尾》认为韩、柳“为道不同，犹夷夏也”。

⑤④ 韩愈《进学解》。

⑤⑤ 韩愈《答尉迟生书》。

⑤⑥ 柳宗元《杨评事文集后序》。

⑤⑦ 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。

⑤⑧⑨ 用韩愈《答李翱书》语。

⑤⑩ 用韩愈《答崔立之书》语。

⑥① 韩愈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。

⑥② 见皇甫湜《昌黎韩先生墓志铭》。

⑥③ 韩愈《答刘正夫书》。

⑥④ 皇甫湜《答李生第一书》。

⑥⑤ 见韩琦《欧阳公墓志铭》。

⑥⑥ 《答谢民师书》。

⑥⑦ 见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。

⑥⑧ 见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二。

⑥⑨ 称骈俪之文为“今体”，与“古文”相对，见李商隐《樊南甲集序》。《旧唐